

生态美学视野下的家园意识

——约翰·济慈诗歌中的植物描写

刘 薇

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5日

摘 要

济慈作为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其诗歌近年来在生态批评和美学方面一直是研究热点。但较少有学者从生态美学理论出发去研究他的诗作。本文主要以《秋颂》《夜莺颂》《我踮起脚站在小山上》以及《伊莎贝拉》为研究对象, 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分析济慈诗歌中的植物书写。“家园意识”作为生态美学的重要范畴, 指的是个体通过其感官对特定场所产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 从感官沉浸和心理剖析层面分析济慈诗歌, 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济慈诗中植物与人类互动叙事的书写模式。

关键词

约翰·济慈, 生态美学, 家园意识, 植物书写, 感官沉浸

The Sense of Ecological Home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Botanical Depictions in John Keats's Poetry

Wei L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April 2, 2026; accepted: June 17, 2026; published: June 25, 2026

Abstract

John Keats, a great British Romantic poet, has been a focal point in recent studies of eco-criticism and aesthetics. However, few scholars have explored hi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o Autumn*, *Ode to a Nightingale*, and *Isabella; or, The Pot of Basil*, analyzing the botanical depictions in Keats's poetry through the len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

“sense of ecological homeland”, a key concept in ecological aesthetics,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feeling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oward a specific place, evoked through sensory experience. Therefore, by examining Keats’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nsory immers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rospe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narratives between plants and humans in his works.

Keywords

John Keats, Ecological Aesthetics, Sense of Ecological Homeland, Botanical Depictions, Sensory Immers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生态美学这一理论的提出基于多学科背景。生态美学这个理论的产生意义重大，不仅形成并丰富了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突破了以萨特为代表的传统美学观，成为美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生态批评转向，还派生出了著名的文学的生态批评的方法以及促进了生态文学的发展[1] (p. 28, 59)。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包括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由此可见，这种美学观是人与自然和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理想化状态[1] (p. 63)。这种理想的审美人生，是对人类当下“非美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批判和觉醒，也是对人类得以美好生存的自然家园与精神家园的重建。阿诺德·伯林特认为这种重建原因在于：“与土地联系这种感觉在我们易变的的城市社会中几乎消失了。这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它可能与在现代社会众多人口中普遍存在的无根感和混乱有关。如果没有和环境的身体联系，尽管拥有住所我们仍会觉得无家可归。” [2] (p. 77)

那么，现代人要如何与所处的环境产生可能的联系以重构自然或精神家园呢？傅修延指出：“如果人人都能像济慈那样热爱自然，贴近大地，那么我们的生命质量一定能提高许多。济慈诗心栖居的‘当下’没有工业城市的喧嚣与侵扰，那是一个个与时空偕行的生态空间：或是万物复苏的春天，或是枝繁叶茂的夏天，或是云高气爽的秋天，或是白雪皑皑的冬天。” [3]这种诗心栖居超越了物理空间的指涉，其核心内涵聚焦于个体与自然生态之间形成的深层精神联结。任卫东认为“这种精神联结缘于人已经置身于世界之中，与现实世界发生了种种联系。” [4]这种精神联结可以视作家园意识的另一种表达，若将济慈的诗歌置于生态美学范畴下的家园意识中分析，既剖析了济慈诗中植物意象的书写策略，又理解了其生态诗歌对家园意识的建构作用。

本文所说的“家园意识”不宜仅被理解为一般性的自然认同或情感归属，而应被放回更具解释力的生态美学与场所理论框架中加以辨析。首先，段义孚提出的“恋地情结”强调人对具体环境所形成的情感依恋，它不仅来自视觉愉悦，更来自身体感知、记忆积淀与价值投射[5]。其次，诺伯格·舒尔茨提出的“场所精神”指出，人之“栖居”并非抽象地占据空间，而是进入一个具有氛围、秩序与意义结构的具体场所[6]。若借助这两个概念重新审视济慈诗歌中的植物描写，则可以发现，植物并不是单纯的装饰性意象，也不只是浪漫主义抒情的背景，而是帮助诗人感知场所、组织氛围、安放情绪并建构精神归属的关键媒介。

与此同时，若要准确把握济慈诗歌中的生态维度，还必须把“消极能力”纳入分析框架。济慈在书

信中强调诗人应当能够停留于“不确定、神秘与疑惑”之中，而不急于以理性求得确定答案。这一诗学观念意味着，济慈面对自然并非采取征服、命名或工具化占有的姿态，而是以开放、容纳和感受的方式进入自然。正因如此，他笔下的自然空间常常既是抚慰性的，又是不稳定的；既能生成亲近感，也始终包裹着无常、衰败与死亡的阴影。据此，本文认为，济慈诗中的“家园”并非一个静态、圆满且没有裂缝的乌托邦，而更接近一种在痛苦现实中被不断想象、暂时建构并随时可能破碎的诗性避难所。

2. 生态美学与济慈诗歌运用

已有济慈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从生态美学视角专门讨论其植物书写与“家园意识”的成果仍相对有限。学界关于济慈与自然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条路径。其一是浪漫主义生态批评路径，强调济慈诗歌对自然生命连续性、地方经验与反工具理性的感受方式；其二是诗学-美学路径，重点讨论感官经验、想象、审美判断与“消极能力”之间的关系；其三是场所与栖居路径，关注济慈如何通过环境氛围、身体感受和空间想象来组织诗歌经验。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以浪漫主义生态批评为理论支点，强调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居住、地方及自然伦理之间的深层关联[7]。相关研究也提示我们，济慈诗中的自然并不只是审美对象，更是诗人思考生命有限性、主体边界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场域。

弗·派尔(Pyle, F.)指出：当一种批评方法取代另一套批评方法时，必须回答为什么这种取代是必要的？这个新的理论方法被期待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个理论做出了什么新贡献[8]。从过往的大量文献规律中可得出，选取生态美学理论分析济慈文本是趋势使然。已有不少学者从生态视角或植物书写上的不同切入点来研究济慈的诗歌，例如斯·布鲁姆(Bloom, S.)认为：“于济慈而言，成为诗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种生态实践，因为它必要化了没有人类存在的自然连续性、感知性、甚至在某些诗篇里出现的智力。”[9]也有不少学者从美学的角度来欣赏济慈的诗歌，雷蒙德·D·黑文斯(Havens, R. D.)曾指出：“济慈已经开始思考美学，并在他的诗篇中第一次进行描绘。这种美学思考不仅仅是出于感知和外部的，更表现在伦理和智力上的优越。”[10]

中文文献过往的研究热潮与西方相似，以 CNKI 上的五十篇文献(均为核心期刊)为分析对象，基于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得出以下图谱。

词频分析图(图 1)[11]直接呈现了“自然”作为其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同时“生态女性主义”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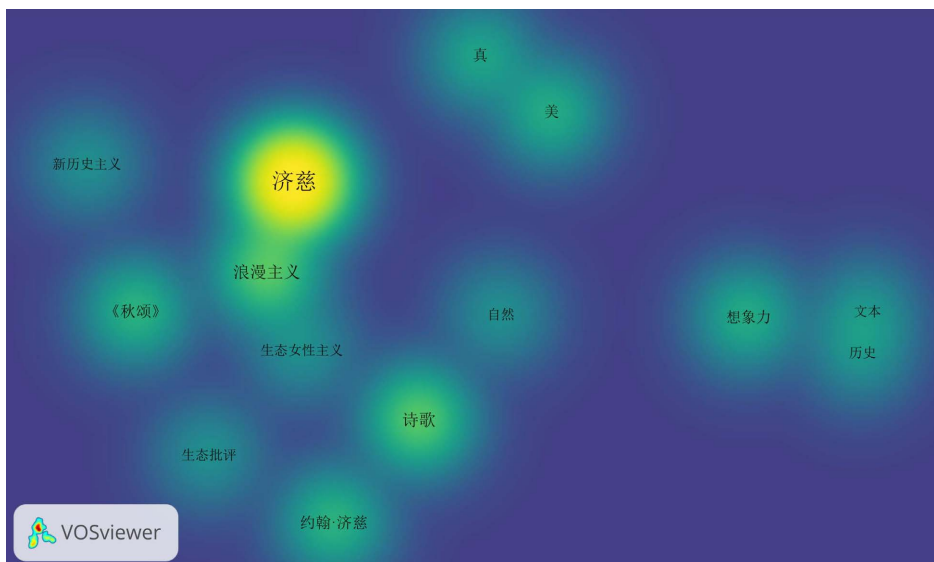


Figure 1. Wor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图 1. 词频分析图

Top 1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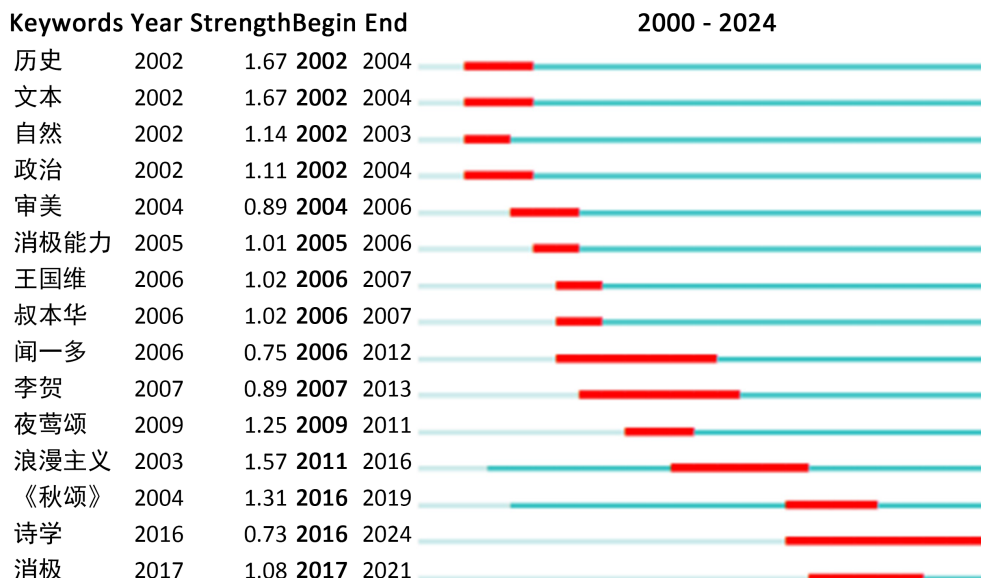


Figure 2.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burst strength in Keats studies

图 2. 济慈关键词爆发强度图

“生态批评”的明确出现，标志着生态理论框架实质性地介入了济慈阐释领域。更为关键的是，关键词爆发强度图(图 2) [12]提供了历时性证据，即“自然”在 2002 年便展现出显著的早期爆发强度(1.14)，奠定了其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这些研究趋势表明，济慈的创作不仅天然地蕴含了生态整体观、万物互联的生命共同体意识以及感官化的生态审美体验，而且学界对其“自然”“诗学”及伦理维度的持续关注，正与当代生态美学向哲学与伦理学深化的理论转向高度同步。

综上，运用生态美学理论深入开掘济慈诗歌中丰富的生态意蕴与当代启示，不仅具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和学术史基础，更是把握其诗学现代性与伦理价值的重要且恰切的路径。

3. 诗歌中的感官沉浸与生态情感唤起

济慈的诗歌在很多时候超越了单纯的文本，而为读者营造了极具画面感的诗歌，并借此画面来传达他的情感。营造诗意的画面感让读者深度沉浸的这种写作手法或写作技巧得益于济慈早期在学校所接受过的教育和训练。傅修延指出：“英国的义务教育提倡实用性与实践性，恩菲尔德学校为济慈认识与描写自然打下了良好基础，克拉克校长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习惯与动手能力，他的学生经常在教师的带领下走出校园辨识自然现象与各类生灵。济慈因而成了花木鸟虫之友，他在课堂笔记本的空白处画满了紫罗兰、石竹之类的植物。” [13] (p. 235)这种亲近自然的做法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济慈的诗歌创作之中，即他的诗歌创作不是脱离实际的凭空想象，而是走进了大自然之后的杰作。

济慈的这种凭感受和直觉进入自然的美学观于后世被体系化和理论化。通过人的身体与所处场所的相互渗透，人因而也就成了环境的一部分，人感受整个环境，环境经验的得出也使用了整个的人类感觉系统。阿诺德·伯林特认为：“美学欣赏，和所有的体验一样是一种身体的参与，一种试图去扩展并认知感知和意义可能性的身体审美。在美学上实现的环境是我们能在其中获取这些可能性的环境。” [2] (p. 86) 可见，人的整个身体感受都能够应用于去理解当代生态美学观，而这种身体感受具体而言之就是感官意识，感官意识进入不同的环境的感受也就是感官沉浸进而唤起人的生态情感。还应指出的是，人不仅仅

只应关注视觉与听觉意识这两种间接的意识，而且应包括嗅觉、味觉、触觉与运动知觉相关的直接意识。当济慈走近五月的春夜时，他的《夜莺颂》中是这样感知的：

只是在暗香里猜想每一朵奇葩，
猜想这时令怎样把千娇百媚
赐给草地，林莽，野生的果树枝；
那白色山楂花，开放在牧野的蔷薇；
隐藏在绿叶丛中易凋的紫罗兰；
那五月中旬的爱子—
盛满了露制醇醪的麝香玫瑰，
夏夜的蚊蝇在这里嗡嗡盘桓。 [14] (p. 13)

在《夜莺颂》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芳香的黑暗”这一特定环境中，诗人通过嗅觉去感知花香、触觉去想象与自然接触以及用听觉感知的蚊蚋的嗡嗡，进而与林间空间深度交融，产生了对这个特定环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诗人对这个生态场景的精细描写，即不同植物呈现的色彩和表现出的形态都让这首诗更富有质感。例如，草地林莽代指的绿色、果树枝指向的棕色、山楂花的白色、彩色的蔷薇、淡紫色的紫罗兰以及红色的玫瑰。这些颜色毫不费力地营造出了大自然的瑰丽美。除了丰富的色彩，这首诗中还蕴含着千姿百态的植物描写，如平铺一望无际的草地林莽、肆意绽放的山楂花和蔷薇、害羞的紫罗兰以及娇艳欲滴的玫瑰，同样对塑造这种生机勃勃的景象起着重要作用，让这幅生态图景更加活泛。

这里诗人的感官沉浸也就是熟称的通感手法以及对不同植物颜色的细致描写使诗人自己包括后来的读者都得以沉浸式地体验济慈精心构造的自然空间，感知与自然的一体。这种描述不仅唤起了诗人的生态情感，也指引着读者去感知这种情感，这也就是后续建构家园意识的基础。

4. 诗歌中的情感强化与心理投射

与现代人书写目的不同，就济慈而言，对自然环境的感知过后不必要得到某种知识认知，体现了某种感情便足以。济慈在致雷诺兹的信中还曾发出这种感叹：“让我们切莫急匆匆地乱窜，像蜜蜂那样不耐烦地嗡嗡作响，在一门知识范围内或所有应到之处四下寻觅。” [15] 济慈诗歌的一大作用仅仅只是用于抒发他本身的情感，因此，他笔下的一切事物也不可避免地是有意图而为之的，并非随意为之。济慈笔下丰富的植物描写既强化了个体与大自然之间的情感联系又投射着诗人的丰富情感。当走进富饶温暖的秋收中，济慈在《秋颂》之中这样感受：

同他合谋着怎样使藤蔓有幸
挂住累累果实绕茅檐攀走；
让苹果压弯农家苍绿的果树，
教每只水果都打心子里熟透；
教葫芦变大；榛子的外壳胀鼓鼓
包着甜果仁； [14] (p. 21)

“合谋”是诗中的核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诗眼。这个词原本带有秘密、计划的意味，用在这里，就将诗人与自然提升到了平等、亲密无间的“同谋”关系。他们不是在祈祷或祈求，而是在一起“策划”如何让生命达到最极致的状态。这种纽带是主动的、创造性的，而非被动的、观赏性的。

《秋颂》的侧重点落于丰收而非景色的衰败。“在这个处处显露富裕的秋季，我们感受不到秋日的

落寞和寂寥，秋风落叶与花香的悲哀，相反我们感受更多的是济慈笔下万物澎湃、秋收万科、丰收富裕的一派欢快景象。” [16]济慈在创作《秋颂》时，已经要到了自己生命的末期，所以他把自己丰富的情感寄予在这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场景之中，投射自己澎湃的情感。《秋颂》中对盛大丰饶的极致描绘，隐含了对生命易逝的认知。“这里诗人的情感与环境的季节巧妙地相互呼应。济慈在此人生阶段创作完成了大部分的伟大作品，与金秋的收获心理满足不谋而合，这种人与自然深度融合的情感共鸣也让《秋颂》余韵悠长。” [13] (p. 236)正因为果实会腐烂，秋天的丰饶才如此珍贵和壮美。这种近乎于疯狂的“让一切都熟透”的愿望，也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是对生命短暂性的一种反抗，这里的情感描写与心理投射着诗人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将生命的甜美和价值发挥到极致。

5. 诗歌中的共生隐喻与家园意识

在感官沉浸与情感投射之后便是升华了的人与自然的共生隐喻和家园意识的体现。共生隐喻较好理解，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依存。家园意识在济慈诗歌中并非表现为一个具体的、被围墙定义的“家”，而是展现为一个充满生命互动、精神归属与和谐共生的整个自然世界。人不是这个家园的拥有者或旁观者，而是其中有机的一份子。济慈是这样在《我踮起了脚站在小山上》描写自然的有机的：

涟漪时而欢快地与水芹嬉戏，
时而在宝石蓝的草叶间纳凉；
散发出鲜活与凉意，
滋养着如盖的绿荫：
互为恩惠，共存共生，
恰似君子行贤德之举。 [17] (p. 182-183)

该诗是《恩底弥翁》的引入小诗。在诗歌开头，济慈即点出“我踮着脚站在小山上”，这个“踮起”的姿态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踮着脚”本身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充满敬畏和期待的动作，仿佛生怕惊扰了这片宁静的圣地。这并非闯入者的姿态，而是一个游子归家时，放轻脚步、心怀温柔的姿态。诗人瞬间将自己融入环境，而非置身事外。在这里，自然界的各种元素不再是孤立的存在，水、植物、阴影构成了一个互惠互利的网络。诗人在后半诗段将这种自然法则提升到人的道德高度——“恰似君子行贤德之举”。这意味着，人类应从自然中学习共生的智慧，并将这种互惠的伦理应用于构建自身的社会和心灵家园。人类最高的“贤德”，就是模仿自然，成为这个共生网络中有益的一员，而非破坏者。这里构建的家园是容纳诗人肉体的物理家园。接着来欣赏济慈在此诗中如何借以丰富的植物描写构建人与自然的共生：

诗行朴素，平静、壮丽，
其间，远山如黛，松涛阵阵；
当传说娓娓道来，
我们领受山楂空地的安宁：
当灵魂展翅飞翔，
迷失于快乐的窒息：
带露的玫瑰轻拂我们的脸，
盛开的月桂从钻石花瓶探出；
在我们的头顶，是茉莉和芳馨的石南，
葡萄藤着绿色盛装，缀满花朵，笑逐颜开；

在我们的身旁，清溪潺潺，
使我们即刻忘却所有烦忧：
仿佛超脱了凡尘，
行走于洁白的云端，看风起云涌。[17] (p. 184-185)

首先，这寥寥几行诗体现出了自然生命的共生，诗中的所有植物都被赋予了旺盛的、甚至拟人化的生命力。“盛开的月桂探出”“葡萄藤着绿色盛装，缀满花朵，笑逐颜开”。这些动词和形容词将植物生命提升到与人类对等的位置。它们不再是被修剪的景观，而同人类一样，是人与自然共同家园中欢欣鼓舞、共同生活的居民。这种拟人化隐喻了一个理想家园的图景：在这里，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类、植物、溪流，都处于平等、和谐、共荣的状态，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共同体。

其次，这个诗段还体现出了精神的共生，家园最终是精神的归宿。“当灵魂展翅飞翔，迷失于快乐的窒息”和“领受山楂空地的安宁”表明，这个自然家园直接滋养和安顿着人的灵魂。自然景象与内心状态形成了同构关系：外部的平静壮丽如远山如黛、松涛阵阵，直接导向内部的安宁与超脱，最终达到忘却烦忧、超脱凡尘的理想心境。

接下来看济慈如何借以诗歌构建其家园意识。“家园”是最能牵动一个人的神经情感之地。他在长诗《伊莎贝拉》中这样描写：

她选中了园中的一只花盆
给那头颅做坟墓，把它放在里面，
用泥土掩盖起来，在上面栽植
美丽的罗勒花，用泪水使它始终潮湿[18] (p. 56)

伊莎贝拉和自己的哥哥们关系并不密切，她将自己的情感全都投入到与洛伦索的爱情之中去，并基于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家园”。这段描写通过盆栽罗勒花的移植过程，展现了自然与伊莎贝拉生活的融合。盆栽罗勒作为一种自我花园形式，象征着洛伦索带来的这种自然在她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也体现了伊莎贝拉对自然的关怀和利用，还体现了家园意识中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理念。

她忘记了星辰、月亮和太阳，
忘记了树木上的蓝色天空，
忘记了清水奔流其间的溪谷，
忘记了清冷秋日里刮起的风；
也不清楚白昼在何时消尽，
新的一天如何开始；只是恬静地
始终低头守着她那美丽的罗勒花，
用自己的泪水使它永远湿润。[18] (p. 57)

我把我居住的那处风景定义为我的家。这种兴趣导致我关心它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在诗中第五十三处的描写。鲍屺平指出：“她忘怀一切，专心看守香草盆，表明她对洛伦佐的爱已经克服了死亡的鸿沟，她在精神上永远和他同在。”[19]也正是在这里，济慈诗歌中的“家园意识”呈现出最富张力的一面：家园不一定总是明朗、健康与和谐的，它也可能是主体在极端痛苦中想象出来的避难所，是一处以封闭、替代与病态眷恋维持其意义的精神空间。若把这一层复杂性纳入分析，则《伊莎贝拉》中的植物书写便不只是“自然慰藉人类”的单线叙事，而成为济慈对于哀悼、执念、死亡阴影与诗性栖居之间关系的深刻呈现。如此一来，本文关于“家园意识”的论证也才能成立：所谓家园，并非没有痛苦，而是主体在痛

苦中仍试图借助自然物建立意义和归属的努力；只是这种努力在《伊莎贝拉》中已明显带上了阴郁、病态甚至近乎哥特式的色彩。

6. 结论

通过对济慈 1819 年集中创作的《夜莺颂》《秋颂》《我踮起脚站在小山上》以及《伊莎贝拉》中植物意象的生态美学解读，我们得以进入诗人精心构筑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同生长的诗意空间。诗人想告诉我们：人类在自然中的关系，不是主人，不是访客，而是子女与兄弟。我们真正的家园，就是这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并为之相互馈赠、共存共荣的生命共同体。保护这个家园，融入这个家园，并从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正是济慈所构建的“家园意识”所能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人类社会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日益深化，环境保护是当今最为迫切的时代议题。济慈的这些诗行不仅引领我们暂时远离外界的喧嚣，更深刻传递出对一切生命、对自然本身，以及对万物共栖这一古老智慧的深切尊重。济慈以其广阔的艺术视野与独特的感知力，经由笔下繁茂而灵动的植物世界，为我们揭示了自然本真的纯粹之美。更重要的是，这些诗篇展现了在人与特定自然场所即家园的深刻联结与和平共处中，心灵所能获得的净化和滋养。正是这种经由植物描写所强化的、根植于具体场所的“家园感”，赋予了济慈的自然诗篇独特而深刻的生态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 [1] 曾繁仁. 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
- [2] 阿诺德·伯林特. 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M]. 陈盼,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 [3] 傅修延. 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06.
- [4] 任卫东. 西方文论关键词: 接受美学[J]. 外国语文, 2022(4): 108-118.
- [5] 刘苏. 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J]. 人文地理, 2017, 32(3): 44-52.
- [6] 陈育霞. 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和场所精神”理论及其批判[J]. 长安大学学报(建筑与环境科学版), 2003(4): 30-33.
- [7] Bate, J. (1993) Romantic Ecology Revisited. *The Wordsworth Circle*, **24**, 159-162. <https://doi.org/10.1086/twc24042448>
- [8] Pyle, F. (1994) Keats's Materialism. *Studies in Romanticism*, **33**, 57-80. <https://doi.org/10.2307/25601046>
- [9] Bloom, S. (2024) "And no Birds Sing":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Carson, Keats, Sagan, and Oliver. Undergraduate Theses, Bellarmine University.
- [10] Havens, R.D. (1950) Of Beauty and Reality in Keats. *ELH*, **17**, 206-213. <https://doi.org/10.2307/2871954>
- [11]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 胡志刚, 王贤文.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2): 242-253.
- [12] van Eck, N.J. and Waltman, L. (2009) Software Survey: VOSviewer, a Computer Program for Bibliometric Mapping. *Scientometrics*, **84**, 523-538. <https://doi.org/10.1007/s11192-009-0146-3>
- [13] 傅修延. 济慈“三颂”新论[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2): 223-236.
- [14] 约翰·济慈. 夜莺与古翁[M]. 屠岸,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13.
- [15] 傅修延. 从“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到“想象之美为真”——论济慈诗歌观点的有机统一性[J]. 外国文学研究, 2021, 43(2): 44-57.
- [16] 沈敬萍. 《秋颂》: 物质美的浪漫和谐乐章[J].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报, 2015, 3(1): 89-91.
- [17] 约翰·济慈. 水中的音符: 济慈诗选[M]. 罗美玲, 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18] 约翰·济慈. 伊莎贝拉: 插图珍藏版[M]. 朱伟基, 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
- [19] 鲍屺平. 济慈叙事诗《伊莎贝拉》的分析研究[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1): 60-77.